

盛极“五四”的《新青年》“通信”栏

[中國] 王玉春

目次

- 一、初创期：蛰伏研求
- 二、高峰期：众声喧哗
- 三、平稳发展期：同人论坛
- 四、盛极而衰：思考与启示

《新青年》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以及新闻传播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界也从各个视角对《新青年》做了大量、充分的探讨和研究，但是，作为《新青年》的一个金牌栏目——“通信”栏，与它所蕴涵的的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相比，目前学术界所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创刊号中发表社告“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实际上，《新青年》的“通信”栏是在之前报刊通信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对于《甲寅杂志》可谓一脉相承。²⁾《新青年》的“通

* 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1) 本文的《新青年》指《新青年》月刊，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终刊于1922年7月1日，共9卷54期。不涉及后来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新青年》第1卷时称《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

2) 关于《甲寅》和《新青年》之间在人事谱系、栏目设置、内容倾向等方面的传承关系，已有不少研究，可参见王观泉〈陈独秀与《新青年》说述〉，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刘桂生〈章士钊与《甲寅月刊》和《新青年》〉，载《百年潮》2000年第10

信”栏中发表了多篇读者来信，反复揭示其对《甲寅杂志》的继承关系。如第2卷第1号“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在来信中指出“唯《甲寅杂志》多输入政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垆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杂志》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杂志》而作也。”（《新青年》第2卷第1号）在第2卷第2号中，读者王醒依在来信中写道：“《甲寅杂志》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无二。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新青年》第2卷第2号）第3卷第3号署名为“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来信同样指出“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当为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杂志》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但不识彼时先生亦主任该志否。若然，则仆弃此不读而终日为无谓之歛嘘，仆之运诚嗇矣。先生之言论风采，曾于《甲寅杂志》见其一斑，其为一般人士所公认者，似不劳仆再为赞誉。”（《新青年》第3卷第3号）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大约共有10封左右的读者来信谈及《新青年》对《甲寅》的继承。不管这些来信是真的读者来信，还是编辑的托名，都表明《新青年》的不回避态度。如此张扬这一继承关系，首先表明《新青年》确实是模仿《甲寅》，具有一脉相承的办刊思想；其次，也源于《甲寅》是当时具有相当影响的刊物，刚出道的《新青年》希望借助《甲寅》扩大影响，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有《甲寅杂志》“通讯”栏的金玉在前，《新青年》的“通信”栏依然是报刊通信栏中运作得最为成功的。

从栏目设置上看，“通信”栏是《新青年》中固定的专栏，而且也是在改为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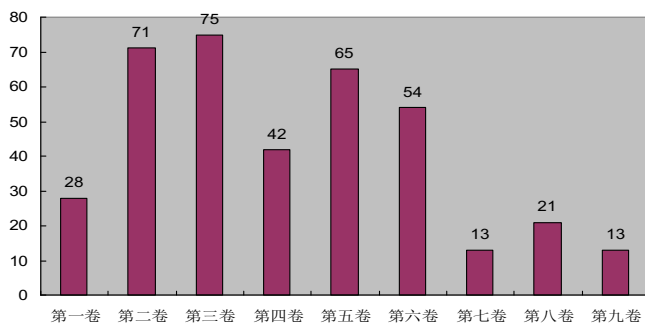
期。闵锐武〈《甲寅杂志》与《青年杂志》的渊源关系〉，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刊之前贯穿始终的唯一的一个栏目。从创刊至终刊的9卷54期杂志中，除了其中的8期空缺外，³⁾其余46期皆设有通信栏。从栏目所占的比重来看，每期的“通信”栏中都刊载了大量的通信，最多的一期，如第3卷第3期，就刊载了25封通信。在设有通信栏的46期中刊发通信总数多达382封，各期通信数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新青年》“通信”栏通信数量统计表

卷数	来信数	复信数	合计
第1卷	14	14	28
第2卷	39	32	71
第3卷	40	35	75
第4卷	19	23	42
第5卷	29	36	65
第6卷	26	28	54
第7卷	8	5	13
第8卷	12	9	21
第9卷	7	6	13
合计	194	188	382

为了更加清楚直观地反映通信栏的发展情况，请见下面绘制的通信栏发展趋势图：



3) 《新青年》中没有通信栏的8期分别为第1卷第5号、第6卷第5号、第7卷第1、2、4号和第8卷第4、5、6号。

趋势图中通信栏的变化清晰可见, 从第1卷的初创期, 到第2、3卷的高峰期, 随后历经第4-6卷的平稳发展期, 直至第7-9卷进入衰落期, 不难看出“通信”栏的起落情况与整个《新青年》杂志的发展走向是十分吻合的。作为《新青年》重要组成部分的“通信”栏直接体现着《新青年》的兴衰变化, 二者可谓息息相关: 一方面《新青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1]的巨大影响力与号召力, 促进了“通信”栏的繁荣与发达; 另一方面, “通信”栏作为报刊中“最生动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也为《新青年》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初创期：蛰伏研求

1915年9月15日, 《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 陈独秀集编辑、组稿、主撰于一身, 撰稿人以安徽籍人士占绝大多数,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初创期的“通信”栏同《青年杂志》一样, 处于“蛰伏研求”阶段, 尚未显现出自家特色。栏目中不仅通信数量、篇幅相对较少(详见下表)。而且通信内容也以“质析疑难”为主, 但编者热心的回复, 契合了“尽心灌输”青年须知的新知识与新立场, 诚心“与青年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的栏目定位, 强化了栏目的重要性,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栏目的关注。

《青年杂志》“通信”栏第1卷通信数量、篇幅统计表

号 数	来信数	复信数	篇幅(页)
第1号	2	2	2
第2号	5	4	2
第3号	4	4	4
第4号	3	3	2
第5号	0	0	0
第6号	3	3	5
合 计	14	14	15

创刊号中共刊登了两封来信。第一封来信署名王庸工，信的开头写道：“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闳议，唤醒青年。”这既是读者对刊物的期望，同时也是编者对刊物定位的重申，与社告中宣布的“本志之作，盖欲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的宗旨是一致的。接着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更可惧者，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几如欧战发生时同一度态，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最后点明了该信的写作意图“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这封信的真实程度向来受到学者的怀疑，限于史料目前尚不能确定这封信是否为编者托写。但是通过来信开头的“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的语句以及来信结尾处的“（后略）”字样，可以看出编者想努力呈现的是来信的真实性。不过，无论来信的真伪，编者将其在创刊号中予以刊登，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编者在回信时虽然再次重申了杂志“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宗旨，并且强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是对来信中谈到的国体变更的理由却一一阐述并逐条否决：“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家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之上。予觉诸人之主张君宪，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之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变更，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去何从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

杨度勿忘今日之言。”（《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更有意味的是，这期杂志的《国内大事记》栏目中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即为陈独秀的〈国体问题〉。在第1卷第3号中，编者又在回复读者李平的来信时引申道“惟举国上下，不许吾人以言论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谅之。”（《新青年》第1卷第3号）那么，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借回答读者来信来品评时事的意图就不言而喻了。而在第2卷第1号中，编者又发表了“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来信：“唯《甲寅杂志》多输入政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垆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杂志》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杂志》而作也。”（《新青年》第2卷第1号）信中明确指出《甲寅杂志》“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由此不难想象创刊号中的“批评时事，非其旨也”这样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潜台词。

另一封来信署名章文治，主要是咨询学校问题：“皖省自二次革命后，学校全毁，韩使来稍规复十之一二。今韩去李来，学界又恐此残喘莫保，青年学子，怅无所之。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希示一二，即当负笈往游也。余续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编者的答复也比较具体：“沪上学校，率有规模，非内地可比。究以外人设立者，校规较善，而毕业可期也。就中以德人之同济学校，美人之约翰书院，法人之震旦学院，最知名。三校尤以同济之科学最精，分医工二科，预科二年，正科三年。预科之前，尚有德文学校，学程四年。上海北京皆有之，中学毕业生，且能听德文讲义者，亦可考入预科也。”（《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创刊号中的两封来信是颇具代表性的：前者为“发舒意见”，阐明观点，并就教于编者；后者为“质析疑难”，属于事物咨询，这正好契合了“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的栏目定位。但第1卷通信栏的内容在整体上还局限于后者，以读者咨询编者答疑为主，详见下表：

《青年杂志》“通信”栏第1卷内容分析表

来信者	主要内容	来信性质	期数
王庸工	国体问题	讨论	第1号
章文治	沪上学校问题	咨询	
李平	法文学校及李石曾译书问题	咨询	第2号
王珏	自修书籍问题	咨询	
吴勤	逻辑学书目问题	咨询	第3号
李平	建议杂志开辟介绍书报栏	建议	
李大魁	佛法问题	咨询	第4号
穗	拳术问题	咨询	
沈伟	英文自修相关书报问题	咨询	第6号
张永言	对前刊文的讨论；美国教育问题	讨论、咨询	
张永言	咨询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差异问题； 对前刊文的讨论	咨询、讨论	第6号
姚孟宽	建议翻译著作；咨询西学研求之方、实用之道及当读之书。	建议、咨询	
辉暹	有关科学卫生的6个问题	咨询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通信栏中咨询性质的来信占到90%以上，从“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之类的对学校的咨询，到“欲闭户自修”“又苦乏相当书籍”之类的对书籍的咨询，可以看出当时青年对新学的浓厚兴趣。读者辉暹提出的问题则近乎“小儿科”：

一、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二、常见人颜色鲜艳而有血色，颇为可爱，此果何法使之然软？三、手指足趾上使爪因何自行脱落？四、异族结婚，后嗣多慧健，究为何故？五、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六、现时各种体操繁多，究以何种于身体之康健上为最适当，可否请示其法？（《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科学常识，读者如此郑重地向编者提问，从侧面反映出“五四”青年在科学知识上的贫乏以及对科学知识渴求。如上

述第六个问题即对“体操”的疑问，就不是个别情况，当时的鲁迅和周作人似乎有过同样的疑惑。我们可以参考一封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来信有做体操之说，而我当时未闻，故以电话问知，得长井答云：先生未言做伸伸开之体操，只须每日早昼晚散步三次（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了），而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而以不ツカシル为度。又每日早晨，须行深呼吸，不限次数，以不ツカシル为度，此很要紧。至于对面有疑似肺病之人，则于此间无妨，但若神经ノセイ，觉得可厌，则不近其窗下可也（此节我并不问，系彼自言）云云。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之所谓深呼吸耶，写出备考。”⁴⁾长井是日本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我当时未闻，故以电话问知”，可知即使周作人、鲁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当时对体操也知之甚少，而信末的“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之所谓深呼吸耶”，说明鲁迅在当时将体操误认为“深呼吸”。精英知识分子如此就更不用说一般的读者大众了。再以《晨报副刊》为例，彼时就不乏对上述科学常识进行探讨的文章，如〈科学与吃饭〉、〈科学与常识〉、〈说卫生〉、〈体操的解释〉等等。其中一篇题为〈衣服〉的文章，不仅列举了衣服调节体温、防御尘埃、防御外伤、被覆裸体的诸多功能，甚至介绍了通气度、温润、吸湿作用、染色、污染、形状等科学知识。[2]时人对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新青年》“通信”栏在此后也刊发了不少读者提倡科学、体育等问题的来信。⁵⁾所以，通信栏中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咨询，将其串起来，恰恰为今天的研究者从多角度多侧面了解“五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信栏中很多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经验和细节的发掘有利于对历史复杂性与差异性的呈现和展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通信栏成为“五四”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部分。

相对于读者以“学生”的身份提出各种问题，编者则扮演着“老师”的角色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问题。虽然不少问题琐碎驳杂，甚至尚嫌幼稚，但编者似乎毫不介意，十分耐心地对来信的提问进行回答。以读者辉暹的上述问题为例，编者的回答就十分详尽具体：

4) 参见鲁迅1921年8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6页。

5) 如《新青年》第2卷第3号“通信”栏中读者李平、潘赞化等的来信。

(一) 人身最要之营养曰血，血之新陈代谢机关曰肺，故肺之卫生不可不谨也。大凡人身及他种动物，其机能愈发达而为重要之器官者，愈易受病焉。例如女子之乳房及生殖器机关，极为发达而亦极易受病。男子之脑较为发达，而受病者亦较多也。他如家畜中，马以善走称，而足部特发达，然马病多在足。羊以毛贵，而多生皮肤病。豕以多脂为上，多得贫血之症。是其器官愈发达，而受刺戟之感益灵敏，灵敏即病之原也。肺脏为空气中之动物，唯一营养机关。人缺饮食尚可生存至一星期之久，若无空气，虽数分钟不能存也。血液之小循环，（即静脉回血由心脏之肺动脉入肺）排除旧瓦斯，gas，而吸收新鲜空气。设空气灰尘中，含不洁有毒之微生物，吸入肺脏，致起种种恶症。其最危险者为肺结核，我国所称为癆病是也。欧美日本各国公共游戏及建筑物，特设痰盂，即预防癆病微生物，混入空气袭人肺脏也。其他病菌由空气传染者极多，癆症特一例耳。普通之空气灰尘，亦决不能使其尽绝，亦不致有害卫生。证之土木工人，及兵士生活可知矣。或曰空气中之灰尘，既不能使之绝，而人生百年，每一时须吸空气数千斛，灰尘入肺，而不致塞满者何也。曰是诚绝妙之问，而造物者亦有绝妙设备，非常人所能识者。盖动物喉部及气管支部之粘膜细胞，有向上运动之力，曰毡毛运动。灰尘入气管，由毡毛运至咽喉，咳吐而出，是即痰也。

(二) 颜色鲜艳。不外多浴使皮肤润洁。多吸新鲜空气使血液清洁。其他化妆之品。徒饰外观。然亦非男子所宜为者。

(三) 手甲足甲自行脱落之说。恐不确。余尝见病足者。甲长二寸余。外人讥中国人不运动。摄取我国长手甲者相片。有长至四五寸者。或因外界挫折。或劳动者终日磨减。不然似无自落之理。

(四) 异族结婚。愚所最主张者也。其理由不外优劣相补而已。吾国亦有同姓相婚。其生不蕃之说。中国之婚禁偏重男姓。而外国并母性而亦禁之。例如中国中表俗多为婚。而欧美亦称为血族也。盖中国之禁同姓相婚。乃出於伦理之见解。西洋之禁血族结婚。乃出於生理之见解。凡一族有一族之优劣之点。一姓有一姓之优劣之点。以同族同姓优点加同种之优点则固优。以同样之缺点更加缺点。则劣甚矣。此理至明者也。故异族异姓相婚。实为人种进化之大原因也。

(五) 运动后心脏鼓动。血行甚速。入浴亦然。恐生血充脑部卒然昏倒之病。他无危险也。

(六) 运动一道。愚酷好之。吾国之拳法。日本之剑术。欧美之体操法。皆略有研究。惟人各有志。如徒欲运动筋血。强健身体。则以极易行之徒手体操为善。老少男女皆可行也。即中国旧式之八段景亦可。必欲於

运动之中。含求技之意。则为术至不一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之所以将上述复信内容全部摘引，意在说明编者对读者提问的悉心答复。不仅如此，编者与读者之间还你尊我让、相敬如宾。如上述通信中，读者在来信的开头便赞美道：“自贵杂志出版以来，风行全国，遗泽后进，曷胜钦佩。兹见贵刊有通询问答一栏。不竟雀跃而请教益焉。”（《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编者则谦虚地表示“来示殊奖，愧甚。承询各节，於生理卫生极有关系。愚於斯学，本未深造，年来世乱学荒，益未能详告，兹谨就所见共研究之幸甚。”（《新青年》第1卷第6号）读者虚心地求教，编者谦恭地回答，这使得栏目中洋溢着和谐的气氛。编者对来信的详细回复也鼓舞了读者通信的热情，如读者李平继在第2号来信中提出问题后，在第3号再次出现在“通信”栏中，信中首先对编者的回复表示了肯定，“刻于贵志二号，得读复言，为述沪上法文学校，及克达二氏之学说，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接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望贵志特辟介绍书报栏，意味青年阅读之南针”。编者当即答复道：“一俟拟定范围，自当勉力以副尊望”。并最终从第3卷第3号开始，开辟了“书报介绍”栏，专门介绍“西文书报”。编者的努力为“通信”栏树立了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美好形象，为栏目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高峰期：众声喧哗

第2卷起《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⁶⁾，并宣布成立“新青年社”，杂志封面上标出“陈独秀主撰”字样。1916年底，陈独秀至北京大学任教，编辑部也于1917正式迁至北京。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青年》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依托

6) 《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真实原因，据汪原放叙述，是因为《青年杂志》与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刊名雷同，该会因此致函益群书社，要求其改名。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北京大学的人才优势，杂志在作者、读者队伍上都呈现出人才济济、门庭若市的局面。这一时期“通信”栏的发展也达到高峰期，通信的数量和篇幅较之以前成倍增加，详见下表：

《新青年》“通信”栏第2-3卷通信数量、篇幅统计表

		第1号	第2号	第3号	第4号	第5号	第6号	合计
第2卷	来信数	8	5	7	4	9	6	39
	复信数	7	4	6	4	6	5	32
	篇幅(页)	10	7	8	9	8	13	55
第3卷	来信数	8	5	14	2	7	4	40
	复信数	8	4	11	2	7	3	35
	篇幅(页)	24	13	28	10	13	21	109

除了普通读者外，很多知名人士也加入到了“通信”栏的讨论中来，文化名人所具有的号召力壮大了“通信”栏的声势，提升了“通信”栏的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促进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深化，使通信栏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问题意识。这其中的一个著名人士就是胡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向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之作，而其文中的核心主张——“八事”，其实最早见之于《新青年》的“通信”栏。第2卷第2号的通信栏中刊载了胡适的来信，在这封来信中他提到了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纲领意见的“八事”主张。“八事”主张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重视，他马上给予了回信，对“八事”主张进行了相关讨论，并发出邀请“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做一切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于是，胡适再三斟酌，将他的“八事”加以修改、整理，于是有了《新青年》第2卷5号上的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由“八事”的相关讨论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再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相关讨论，这些讨论促进了思考的深入与成熟，共同创造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这一过程也成为彰显通信栏讨论功能的经典个案。

在内容上，鉴于第1卷“通信”栏中偏于事务咨询的倾向，在第2卷第1号陈独

秀即表示：“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社告〉，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表明陈独秀开始有意识地试图削弱“通信”栏目在前一个时期的“事务咨询”色彩，转而成为“析理辩难”的“讨论”，以期“真理愈辩而愈明”。因此，这一时期通信栏中的讨论涉及的话题各种各样，栏目功能也逐渐由“质析疑难”为主的咨询转为“发舒意见”为主的讨论，从而拓展了“通信”栏的言论空间。除了上述的文学革命的相关探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讨论主题即孔教和旧道德问题。从下表中，不难看出通信栏中进行的大量讨论。

《新青年》“通信”栏对孔教和旧道德问题讨论统计表

来信者	复信者	期号
常乃惠	陈独秀	第2卷第4号
吴虞	陈独秀	第2卷第5号
常乃惠	陈独秀	第2卷第6号
蔡元培	陈独秀	第3卷第1号
傅桂馨	陈独秀	第3卷第1号
常乃惠	陈独秀	第3卷第1号
淮山逸民	陈独秀	第3卷第1号
俞颂华	陈独秀	第3卷第1号
常乃惠	陈独秀	第3卷第2号
L. T. M	陈独秀	第3卷第2号
刘竞夫	陈独秀	第3卷第3号
俞颂华	陈独秀	第3卷第3号
毛义	陈独秀	第3卷第3号
李杰	陈独秀	第3卷第3号
钱玄同	陈独秀	第3卷第4号
新青年爱读者	陈独秀	第3卷第5号
吴虞	陈独秀	第3卷第5号

这一时期的编读关系依然十分融洽，读者踊跃来信，编者则热心回复。其中读者毕云程与陈独秀之间的对话就颇具代表性，第2卷的“通信”栏中第1至第4号每期均有毕云程的来信，其中她在第2号的来信中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即认为陈独秀的思想中有“悲观主义”的倾向，这与陈独秀的自我定位大相径庭，因此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新青年》第2卷第2号）毕云程接着复信对其进行了一番“心理分析”：“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馥凝、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虽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新青年》第2卷第3号）在毕云程的心理分析下，陈独秀不仅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悲观主义，更引发了对于自己心路历程的一段告白：“仆误陷悲观罪决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文明之进化，一旧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命运迫在目前，盖若烈火焚居及一于眉睫矣……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随后，毕云程再次回信加以勉励：“以今日时局之艰危，仆岂敢妄以为乐观。仆身居工商界十年，所感之苦痛，较先生尤甚。特仆意无论时局危至若何地位，吾人之精力一日未绝，必须与此之艰危环境奋战……”（《新青年》第2卷第4号）这些真挚、坦诚的往来通信一方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迥异于以往慷慨激昂的驳斥康有为、“敬告青年”的另一个更加真实的陈独秀，另一方面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平等交流也彰显了通信栏平等对话的特征。例如另一读者的常乃惠，其以后学身份与陈独秀辩论时，有理有据，直言不讳，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读者对刊物的评价仍以褒扬为主：“备读大志造福青年无任崇仰，又辟通信一门以为读者析疑辩难之助，用意良甚。”（师程葛致记者，“通信”栏，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贵杂出版以来，吾青年界得一良友。提携指导，不可谓不勤矣。”（淮山遗民致记者，“通信”栏，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读公文而不翻然悟者，其必天下之丧心病狂者矣。”（刘竞夫

致陈独秀，“通信”栏，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还有读者成为了通信栏的“常客”频频光顾，如读者李平，在第1卷的通信栏中刊登了他的两封来信，在第2卷中又有他的3封信，而且他题为〈新青年之家庭〉的文章还刊登在“读者论坛”中，可见其对《新青年》的关注度。

三、平稳发展期：同人论坛

《新青年》曾进行两项重要的调整：第一，自第4卷第1号起，杂志改组为北大的“同人刊物”，“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本志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第二，刊物的编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改先前的陈独秀独立“主撰”。自第4卷第1号起开始实行编辑集议制，由北大同人组成的编辑部同人共同编辑。自第6卷起，改行轮流主编制，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由同人共同经营的《新青年》，销售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连赠送交换加起来不过一千份，这时最高竟达一万五六千份。^[3]此时的《新青年》无论是在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方面，都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的“通信”栏也随之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并随着杂志的发展进行了栏目的相关调整，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新青年》“通信”栏第4-6卷通信数量、篇幅统计表

		第1号	第2号	第3号	第4号	第5号	第6号	合计
第4卷	来信数	3	4	3	4	2	3	19
	复信数	3	4	3	4	2	7	23
	篇幅(页)	13	12	10	20	6	8	69
第5卷	来信数	3	7	2	5	6	6	29
	复信数	3	7	3	4	8	11	36
	篇幅(页)	6	26	10	22	22	26	112
第6卷	来信数	7	7	5	2	0	5	26

复信数	7	8	4	2	0	7	28
篇幅(页)	14	25	9	12	0	20	80

首先，从第4卷第1号起编者根据书信的主要内容给每组通信冠以标题，从而使“通信”栏中讨论的问题一目了然。这种主题化的做法，使通信栏的栏目特征更加清晰，不仅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也促进了栏目的繁荣。来往通信在内容上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主题意识，第4卷的通信栏平均每号有3个不同的主题，到了第5卷第6卷平均每期有6个不同的主题，最多时达到8个。并且很多通信都是一信多复，如第4卷第6号中对张厚载关于新文学与中国旧戏的讨论，便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四人的回信，无疑显示出同人编辑的优势，推动了讨论的发展以及通信栏的繁荣。

其次，在内容方面更趋于学术化，4卷以前的那些青年话题、时政话题已经少之又少，随之增加的则是诸如新韵、汉字索引、注音字母、罗马字、修辞学之类的学术性话题。通信内容的变化也导致了来信者的变化，以往的读者来信明显减少。这一时期的通信主要集中于编辑同人及朋友之间。这使得原来的编读场所变为同人的内部论坛。从中可以看出栏目定位的变化，编者已不满足于对青年的“改造”与“辅导”，转向选择与同等知识水平者进行“对话”。新文化人的这一自我调整体现在他们主持的杂志出版方面，则更加注重学理研究，使之成为“学者社会之杂志”（蔡元培语）整个栏目渐显学术化的倾向，理性化、学理化的语言逐渐取代了偏于感性化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这一时期，通信栏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世界语问题、文学改革问题，国语和白话问题，其中国语和白话问题仍是承接上一阶段的讨论焦点。

主题之一：对世界语问题的相关讨论统计表

篇名	来信者	复信者	期号
Esperanto	钱玄同	陶履恭	4卷2号
论Esperanto	孙国璋	钱玄同、陶履恭	4卷4号
论Esperanto	区声白	陶履恭	5卷2号

论Esperanto	孙国璋	陈独秀	5卷2号
反对Esperanto	朱有昀	胡适	5卷4号
中国文字与Esperanto	姚寄人	钱玄同	5卷5号
中国文字与Esperanto	胡天月	钱玄同	5卷5号
中国文字与Esperanto	区声白	钱玄同	6卷1号
Esperanto	周祐	钱玄同	6卷2号
Esperanto与现代思潮	凌霜	钱玄同	6卷2号

主题之二：对文学改革问题的相关讨论统计表

篇名	写信人	复信人	期号
新文学之运用	俞慧殊	钱玄同	4卷3号
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	钱玄同	陈独秀	4卷4号
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	盛兆熊	胡适	4卷5号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朱经农	胡适	5卷2号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	任鸿隽	胡适	5卷2号
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学	朱我农	胡适	5卷2号
附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	-	胡适	5卷3号
文学上之疑问三则	张效敏	吴敬恒、钱玄同、胡适	5卷5号
汉文改革之讨论	张月镰	钱玄同	5卷5号
文学革命与文法	周祐	钱玄同	6卷2号
对于文学改革之意见二则	彝铭氏	钱玄同	6卷2号
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字	张耘	胡适	6卷3号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	潘公展	钱玄同	6卷6号

主题之三：对国语和白话问题的相关讨论统计表

篇名	写信人	复信人	期号
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胡适	钱玄同	4卷1号
新文学与新字典	沈兼士	钱玄同	4卷2号
四声	李锡余	钱玄同	4卷2号
句号符读	钱玄同	-	4卷2号
注音字母	吴敬恒	钱玄同	4卷3号
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	林玉堂	钱玄同	4卷4号
新文学与中国旧戏 ⁷⁾	张厚载	胡适、钱玄同、刘 半农、陈独秀	4卷6号

论句读符号	慕楼	胡适	5卷3号
文字改革与国语报纸	朱庸	陈独秀	5卷6号
答Y. Z. 君	-	刘半农	5卷6号
横行与标点	陈望道	钱玄同	6卷1号
新文体	查钊忠	钱玄同	6卷1号
修辞学的题目	黄介石	陈独秀	6卷1号
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	钱玄同	周作人	6卷2号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俞平伯	胡适	6卷3号
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	陈懋治	胡适、钱玄同	6卷6号
写白话与用国音	郭惜黔	钱玄同	6卷6号
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钱玄同	陈大齐	6卷6号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通信栏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过程，分享他们对于问题思考的感受与经过，很多重要问题正是在这种交流碰撞中逐渐展开和发展的。

再次，编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时期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反对意见居多，即使普通读者也很少象之前那样以“学生”的身份虚心请教。来信中出现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声，有的甚至直言不讳“鄙人近来细阅大志，似乎三卷之内容，不若二卷。而二卷新青年，犹不若一卷之青年杂志也。进化公例，恒后来居上，而贵志反之”（顾克刚致陈独秀，“通信”栏，载《新青年》第3卷第5号。）。还有读者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贵志的通信栏，不过一个雄辩场罢了，没有一些商榷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正有无数青年男女，要与诸君商榷种种要事，你们可以新开一栏么？”（Y. Z. 致记者，“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通信”栏，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读者不客气，编者更不客气。那个在第1卷中对诸如“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的问题都愿意耐心、详细回答的陈独秀，那个唯恐自己的答复不能让读者满意而一再强调“倘不当尊意，尚望再示”的陈独秀，一反之前的谦恭态度，变得言辞尖锐、火气十足。对于反对言论，陈独秀提出了不同的应对原则：

7) 张厚载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对中国旧戏的相关讨论，除了对旧戏的态度外也谈到了白话改革和创作的问题。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辨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记者复李大魁，“通信”栏，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陈独秀将反对之言论分等对待的策略看似合情合理，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做到，因为很多言论难以如此精确的划为等级，在陈独秀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常识的问题，在他人看来却是需要讨论的，所以往往会导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之类的偏激言论。反映在通信栏中，陈独秀的有些答复火药味十足，如第5卷第6号中对读者爱真的回答，便明显偏离了编者应有的中立立场。与之相比，钱玄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不同的意见动辄冷嘲热讽，如第5卷第1号的“通信”栏，他在给戴主一的回信中甚至使用了“野蛮人”、“尊屁”、“粪”等粗语。

但是，轮流编辑的实施使栏目中编者的回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此时，编辑同人中的胡适接演了前几卷中的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态度温文尔雅、谦恭有加。同样是批评的来信，如第5卷第1号的“通信”栏中汪懋祖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新青年》“如泼妇骂街”、“似不容人以讨论”的霸道作风，但是胡适却在回信里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表示：

此种净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言。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

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胡适复汪懋祖，〈读新青年〉，“通信”栏，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

第6卷第4号中面对蓝公武提出的《新青年》随意谩骂、“令人看了生厌”的批评，胡适在回信中再次引用了上述回答，并明确表示自己主张平等讨论的态度。通信栏中同人态度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偏激之词不排除有制造舆论的考虑（详见第四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此处的关注点不在于对二者态度的评价，而在于通过同人的巨大差异揭示出栏目编辑的多元性与包容性，而《新青年》对那些刺耳声音的刊载本身就显示出一种包容性。同人轮流编辑体现出不同的编者的风格，从而形成了有效的互补：尽管陈独秀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但实际上，通信栏内却展开了讨论，而且容纳了不同的意见。在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常与读者“对骂”的情况下，胡适的“特殊”姿态，使得很难用封闭与开放、霸道与平等这些截然对立的措词来简单评价这一时期的“通信”栏。因此，刘半农在给Y. Z. 君的回信中会坚称“本志的通信栏，本来是‘商榷’性质，并不专是‘雄辩’”（《新青年》第5卷第3号）。

四、盛极而衰：思考与启示

1920年，陈独秀返回上海，杂志社也随之牵回上海，《新青年》发生了第二次转型。作者阵容发生了变化，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社会主义者加入到作者和编辑的行列。同人间开始出现明显分裂，先前的“集体讨论—个人主编”改为陈独秀独立主编。1920年9月，从第8卷第1号起，刊物正式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通信”栏随之急剧萎缩，首先，在数量和篇幅上大量减少，而且前后8期出现栏目的空白，在栏目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跌入最低谷，详见下表：

《新青年》第7-9卷“通信”栏通信数量统计表

	第1号	第2号	第3号	第4号	第5号	第6号	总计
第7卷	0	0	6	0	3	4	13
第8卷	11	6	4	0	0	0	21
第9卷	0	2	4	4	0	3	13
总计				47			

其次，内容上也发生明显转变。随着《新青年》从综合性的思想评论刊物向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论刊物过渡，通信栏逐渐萎缩。之前的有关文学革命的讨论这时竟然一篇都没有，转为“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第7卷第6号）、“工人教育问题”（第8卷第2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第9卷第4号）等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厚。而且编者的回复也较少，而且很多来信没有回复，复信率之低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回了信，信中也往往寥寥数语，心不在焉。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的“最后一页”有一个《新青年》1至5卷的再版广告，在这个广告中特意提到《新青年》开手就设置“通信”一栏，“因为通信可以随便发表意见。所以那通信栏里真有许多好材料现在也还是不能不看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通信”栏目对办刊者自身的重要性。但时过境迁，发达一时的通信栏已经逐渐萎缩，“学术讲究宽容、开放与自由；政治则而要信仰、认同，甚至献身”^[4]，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使得本应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通信栏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最终伴随着《新青年》的终结而成为了历史的烟云。

作为金牌刊物的金牌栏目，《新青年》“通信”栏从栏目的设置、内容、编辑到文体形式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重要的影响。

第一，通信栏中内容极其丰富，大到文学如何改良、孔教是否该批，小到《金瓶梅》如何评价，横行与标点是否当行，还有世界语的提倡、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等，几乎涵盖了“五四”新文化的各个子命题。可以说，通信栏是整个刊物的灵魂，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都是在通信栏中提出并展开的^[5]，显示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第二，通信栏是主撰及编者部同人合力经营的品牌栏目，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编辑部同人的参与一方面保证了通信栏的正常运行，使栏目一直能够保持回信与来信同步刊发甚至一信多复的状态；另一方面，编辑部同人之间不同的编辑理念又可以形成互补，既容纳了感性、偏激的言论，又于众声喧哗中展露了思想的锋芒，从而为栏目中营造了多重对话的言论空间，使之成为《新青年》“最生动最丰富的部分之一”。

第三，通信栏文体初露锋芒，《新青年》“通信”栏不仅提供了多元差异的对话语境，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如陈平原教授所指出的，“通信”作为一种“思想草稿”^[6]，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又便于彼此意见的交流，成为“五四”时代的一种对话方式。

《新青年》“通信”栏在五四时期引发了鲜明的“晕轮效应”，它的成功不仅改变了通信栏的边缘地位，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报刊通信栏的繁荣，为其后通信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通信栏的两大内容——质析疑难与发舒意见，成为日后报刊通信栏发展的两大趋势：以质析疑难为主的通信栏发展成为信箱之类的咨询板块；而发舒意见为主的通信栏则发展成为众声喧哗的言论版。而“通信”栏在第7—9卷的盛极而衰则留给我们重要启示：通信栏的本质在于对话，真正的对话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真诚的、宽容的、和谐的，在宽容和谐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坚持独立的思想，彼此尊重包容，追求理性对话，这才是通信栏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为重塑当代传媒的言论生态环境提供了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

（本文为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五四报刊通信栏与言论空间建设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10YJ CZH168。）

参考文献

- [1]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 [2] 余幼尘〈衣服〉，载《晨报副刊》1922年7月29日。
- [3] 戈公振〈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15—316页。
- [4] 阎小波〈南学会：空间、结构、功能及影响——读《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40页。
- [6]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Abstract>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of *The New Youth* Flourishing in the Time of
'the May Fourth'

Wang Yuchu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a Liaoning Dalian 116023)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of *The New Youth*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effects, from column establishment, content, edit to literary style form. The success of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not only changed the edge status, but also promoted enormously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and provided rich experi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respondence. As a golden column in the time of 'the May Fourth',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of *The New Youth*, has not been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cademics and research, compared with th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The New Youth*, 'the May Fourth'

투 고 일 : 2011. 1. 10. / 심 사 일 : 2011. 1. 20. ~ 2011.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2. 17.